

1935 年《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Moscow 1935 in China

许皓 李百浩
XU Hao, LI Baihao

摘要：1935 年编制完成的《莫斯科改建规划》建构了一套“社会主义城市”的规划方法，体现了独特的规划智慧。二战后，莫斯科的规划建设经验向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传播，成为规划师们制定方案的重要参照。文章基于规划知识跨国传播的视角，从理念方法和营建手法两个方面，以 1950 年代在华苏联专家的规划活动为线索，揭示《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笔者认为《莫斯科改建规划》提出的人口规模与密度控制、公共健康导向的分区原则、多学科综合决策等思路，影响了中国规划理论体系的初始构建；同时，笔者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重点建设城市的规划方案采用了与莫斯科相似的空间形式，三轴放射、绿地系统、扩大街坊等形态仍隐含在当今的城市空间中，可视为规划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本研究旨在掌握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源流，加深对中国城市空间形态“莫斯科影响”的认识和重视，为相关城市更新活动提供参考。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Moscow, completed in 1935, constructed a set of planning methods for “socialist cities”, reflecting unique planning wisdom. After World War II, Moscow’s planning experience spread to the socialist camp, becoming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planners to formulate pla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dissemination of planning knowledg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Moscow in China from two aspects: conceptual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using the planning activities of Soviet experts in China in the 1950s as a clu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density control, public health-oriented zoning principles,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decision-making proposed in the plan have influenced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China’s planning theory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lanning scheme for key construction cities adopted a spatial form similar to Moscow. The forms of three-axis radiation, green space system, and expanding neighborhoods is still hidden in today’s urban space and can be regarded as a special type of planning heritage. The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and attention to the “Moscow influence” of urban spatial form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ated urban renewal activities.

关键词：莫斯科改建规划；城市规划史；社会主义城市；规划遗产；苏联专家；规划扩散

Keywords: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Moscow; Urban Planning History; Socialist City; Planning Heritage; Soviet Expert; Planning Diffusion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早期京沪两地的城市改造及空间形态演变研究（1949—1965）”（22YJCZH206）

作者：许皓，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1319745040@qq.com

李百浩，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libaihaowh@163.com

① 关于 The Reconstruction Plan of Moscow 的中文译名，目前常见的有“莫斯科改建计划”“莫斯科改建计画”“莫斯科改建规划”，考虑到当前的使用习惯，笔者将 Plan 译为规划，本文统一使用“莫斯科改建规划”的译法。

1935 年编制完成的《莫斯科改建规划》^①建构了一套“社会主义城市”的规划方法，体现了独特的规划智慧。二战后，在苏联大国崛起的背景下，《莫斯科改建规划》被传播到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朝鲜、波兰、东德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莫斯科改建规划》被视为“规划样本”，成为规划师们制定方案的重要参照^[1]。目前，国内外有关《莫斯科改建规划》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2-7]，但专门讨论其在中国传播与影响的成果尚未出现。本文基于相关中文历史资料 and 城市规划史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 1950 年代在华苏联专家（下称“苏联专家”）的规划活动为线索，从理念方法与营建手法两个层面，揭示《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这段规划历史能够反映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知识初始设定的背景和逻辑，便于学界深刻理解新中国早期城市形态及其形成脉络。

1 《莫斯科改建规划》的形成及其传播

1935 年，正在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 年）的苏联已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然而，彼时的苏联城市现代化速度远不及其工业发展的速度，与当时的伦敦、巴黎、纽约相比，莫斯科陈旧的环境、

落后的设施、弯曲的窄路、零碎的街坊，均与其首都地位极不相称。以斯大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意识到，莫斯科必须改变落后的城市面貌。1931 年 6 月，苏联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决议指出：“没有一个建设总计划，莫斯科的建设将会产生混乱现象。因此，必须拟定一个认真的、科学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发展莫斯科市政建设的计划”^[8]。

关于社会主义城市的聚居方式，在 1929 年的苏联有过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交锋，这场讨论比当时西方国家对类似问题的探索更为广泛^[9]。在此过程中，苏联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实验性方案，并促成了两大流派的产生，即“城市集中主义”和“城市分散主义”。前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城市聚落应具备最高的技术与服务标准，主张日常生活应实现完全公共化，如废除私人厨房、建立公社等；后者针对电气化、机动化等技术的影响，主张将社会主义的城市聚落分布在交通沿线，建立接近自然的社区^[7]。随后，苏联进入斯大林主政的 1930 年代，过去多元的探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官方认可，采用何种思想建设莫斯科仍是未知。关于早期的实验性方案，1931 年 6 月，莫斯科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作了题为《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指出：“苏联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和技术是落后的，规划知识是有限的，规划学科也不高明”^[10]。以此为标志，国家意识形态开始介入城市规划领域。这一转变导致了苏联民间城市规划组织的解散，各地相继建立了政府主导的规划机构，城市规划开始成为一项政府职能。1934 年担任莫斯科首席建筑师的西蒙诺夫（Семенов）牵头成立了“莫斯科改建规划理事会”；1935 年 7 月，《莫斯科改建规划》编制完成并向社会公布。有关社会主义城市规划指导思想的纷争就此停止。可以说，《莫斯科改建规划》确定的基本原则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为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直至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以《莫斯科改建规划》为范式的城市总体规划在苏联规划实践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11]。

作为 20 世纪规划史中的重要里程碑，《莫斯科改建规划》最主要的遗产价值是初步构建了一套“社会主义城市”的规划方法。相较于同时期仍停留在“殖民主义规划”“城市美化运动”的西方城市规划，它所体现的规划思想在 1930 年代—1950 年代的国际城市规划界处于领先地位，并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1937 年英国规划专家编写的《正在建设的莫斯科》（*Moscow in the Making*）对莫斯科改建规划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如果该规划得以实现，将创建世界

上有史以来规划最完善的城市”^[12]。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经验的背景下，《莫斯科改建规划》得以在中国知识界传播。作为 1953 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成员的梁思成，在访问归国后撰写的文章中提到：“莫斯科改建计划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13]。1954 年，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翻译出版了《城市规划设计参考资料——关于莫斯科的规划设计》，向国内规划工作者传递了莫斯科规划建设的宝贵经验（图 1）。

值得注意的是，1950 年代苏联专家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大多有在莫斯科的工作经历，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莫斯科改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①。当时，《莫斯科改建规划》被视为“解决复杂城市建设问题最大的实验室”，进而成为苏联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的蓝本^[15]。由此可以推断，莫斯科的规划建设经验是苏联专家知识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2 《莫斯科改建规划》理念方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2.1 人口规模与密度控制

2.1.1 人口规模控制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 年），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人们更愿意迁移到首都莫斯科。短时间内的快速城市化使得莫斯科有限的城市资源开始变得紧张，居民生活水平也因此很难快速提高。1931 年，莫斯科引入了高度分级的粮食配给制度，稳定了社会主要群体的生活水平，但当时莫斯科的城



图 1 《莫斯科改建规划》的原著及其中译本

资料来源：左图源自 <http://tehne.com/library/generalnyy-plan-rekonstrukcii-goroda-moskvy-general-plan-reconstruction-city-moscow-moscow-1935>，右图源自参考文献 [14]

① 首批苏联专家多有参与莫斯科改建规划的实践经历，其中阿布拉莫夫（Абрамов）为莫斯科市苏维埃副主席、副市长；第二批苏联专家中的克拉夫丘克（Кравчук）曾就职于莫斯科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研究院，并担任副院长；第三批苏联专家主要是莫斯科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团队，该院建筑规划室主任勃得列夫（Будрев）是莫斯科改建规划的主要完成人之一，在华期间任苏联专家组组长。

市基础设施仍处于较低水平^[16]。为了城市的合理发展,需要防止人口快速增加,限制城市人口的规模因此成为莫斯科方案的首要原则之一^[6]。《莫斯科改建规划》提出:“不准在莫斯科继续建造新的工业企业,要限制莫斯科的发展,把大约500万人和为500万人口生活文化需要进行完善的服务(住宅、城市运输、供水、排污、学校、医院、商店、食堂等)作为莫斯科市区发展的依据”^[17]。

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与扩建北京城市规划草案》(1954年)和《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1957年)在人口规模方面也效仿莫斯科,采用500万的人口上限规模^[18]。在讨论首都北京人口规模问题时,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也认为:“莫斯科人口是限制在五百万人的范围内的。我们很感谢他给了我们一个标准,作为北京将来的参考”^[19]。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人口规模是推算城市用地、交通运输组织和生活服务设施配置的主要依据。因此,确定人口规模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规划方案制定的前提。以包头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为例,1954年1月,包头市规划工作组提出了城市人口规模为100万人和150万人的两个规划方案;同年4月,国家建设委员会将其人口规模缩减为80万人,规划工作组据此重新修订了规划方案^[20]。

2.1.2 人口密度控制

在控制人口流动的同时,社会主义城市还致力于降低人口密度。1933年苏联城市规划专家哈尔托夫(Khaustov)提出“人口密度”的概念,以人/hm²为单位作为建立空间秩序的考虑因素,认为合理的人口密度有利于建立健康有序的城市,有利于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16]。《莫斯科改建规划》将控制人口密度作为规划目标之一,并提出:“鉴于莫斯科现有市区(2.85万公顷)的个别区域建筑物过密、人口拥挤,不能保证日益增加的人口的正常分布,有必要逐步将市区扩大到6万公顷,市区建设要考虑逐渐降低居民密度”^[17]。

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城市建设计划局局长曹言行作为1953年访苏专家团的一员,归国后撰写的《我对苏联建筑科学的几点体会》一文介绍了莫斯科进行人口密度控制的做法,“莫斯科规定街坊内平均每公顷为400人,最高不得超过500人”^[21]。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在指导北京城市规划工作时,也曾将北京与莫斯科的人口密度进行比较,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大城市中避免集中过多的人口,(北京)预计的城市地区,平均每人将占有147平方公尺的面积,比较莫斯科的改建计划,以每人120平方公尺的计算尚超出很多”^[22]。在规划方案编制过程中,人口密度成为现状调研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如1953版大同市总体规划专门绘制了现状人口密度分布图^[20]。

2.2 公共健康导向的分区原则

现代主义用地分区思想最早出现在1870年代的德国,目的是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土地使用不均所产生的拥挤与混乱^[23]。然而,当用地分区原则被应用于殖民主义城市时,常常与种族隔离、阶层分异等现象相联系。例如:在沙俄时期规划的大连,整个城市按种族划分为欧洲人区与中国人区;按社会等级划分,欧洲人区又被划分为普通市民区和别墅区^[24]。当用地分区原则应用于逐利型社会时,又会出现忽视公共利益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冶金工业中心匹兹堡,最适于布置居住区的山坡地被工厂占用,居住区只能位于低凹地带,经常被工厂的烟灰遮蔽^[25]。可见,20世纪早期的城市用地分区实践过多关注殖民者利益或经济利益,公众利益并不在考虑的范围内。《莫斯科改建规划》对人民大众的普遍关怀与上述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要求把用地中最好的地段划为生活居住区。基于这个原则,莫斯科选择了环境方面最卫生的西南地区作为城市居住用地的发展重点^[25]。

新中国成立初期,援华苏联专家向中国规划工作者传授了以公共健康为导向的用地分区原则。1952年8月,专家穆欣(Мухин)在指导沈阳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时,针对近代日本人编制的规划方案指出:“规划要求沈阳建成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战争工业区,把工业放在最方便的地方,而把工人住宅区夹在两个工业地带之中,而且连一小块绿地都没有”。他还列举了莫斯科河、顿河、伏尔加河的改造经验,提出:“要利用好城市的河流水面,使人民群众能享受沿河两岸的自然风景”^[26]。在实际操作中,规划主要是从风向和水流流向两个角度优化公共健康环境,从而确定城市居住区与工业区的相互位置关系。关于北京工业用地的选择,巴兰尼克夫(Баранников)认为:“工业区的位置,要按照北京市的风向(西北风向22度—30度),建设在城市的东南方最为适宜,避免烟灰瓦斯等刮到市中心”^[22]。1953年9月,穆欣在上海指导城市规划工作。他在有关工业布局的调整中运用了同样的理念,提出:“将有三废产出的桃浦工业区布置在城市下风,以此避免烟尘直接影响市区。并取消北新泾工业区,因其在苏州河上游,污水影响下游的市区”^[27]。

2.3 基于多学科的综合决策

1920年代,围绕着社会主义城市生活,苏联建筑师们展开了各式各样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大胆前卫的新莫斯科方案^[28]。1931年6月,莫斯科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作了题为《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指出:“科学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它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10]。以此报告为节点,有关莫斯科规划的讨论开始有别于早期的宏大理想,

变得更加务实。规划师们开始探究交通、能源传送、供水、排水、通信等新技术如何塑造社会主义人居环境。反映在工作方法上,苏联城市规划开始融合其他学科的现代科学知识。1934 年成立的“莫斯科改建规划理事会”,除规划工作组外,还包括工程运输组、技术经济组、森林保护带组、园艺组、公园组^[29]。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与此类似,包括经济资料组、总体规划组、公共交通组、市政规划组、电力电热组、煤气组^{[19]207-208},体现了城市规划实践所具有的多学科协同、集体决策的技术特点。

在 1950 年代技术援助的过程中,苏联专家也提及了多学科综合的要求。例如在 1952 年北京的都市计划座谈会上,穆欣在评价规划方案中的铁路与运河问题时提问道:“这张图上的铁路线的制定是哪些人参加的?现在摆的这张草图的制定是否有铁路专家参加?还是仅仅是建筑师设计的。水源是一个大问题,建筑家本身不能解决河水怎么流的问题,建筑家不可能决定运河怎么画,必须找这方面的专家来研究”^[30]。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活动是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为降低城市建设成本,“算经济账”成为评价规划方案的重要一环,工程经济学因此被置于重要位置。机构设置方面,在苏联专家什基别里曼(Шкибериман)的帮助下,中国城市规划工作建立了经济类工种^[31],成立了技术经济组。知识传播方面,大维多维奇(Большие Видовичи)的著作

和列甫琴柯(Левченко)的著作分别被译为中文出版,即《城市规划:工程经济基础》^[32]和《城市规划:技术经济指标计算》^[33],成为当时各地城市规划方案编制的主要参考用书,对中国城市规划行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莫斯科改建规划》营建手法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3.1 采用“三轴放射”形式构建中心区秩序

莫斯科作为首都,要特别考虑国家形象的塑造问题,因此中心区的改建就显得格外重要。新的社会主义生活要求,行政文化职能取代商业贸易职能成为城市中心的主导职能^①。为适应中心区在职能上的变化,《莫斯科改建规划》提出扩大中心区范围,以苏维埃宫为中心放射出三条轴线,向西南的中央文化休息公园方向拓展。新中心区在容纳新职能的同时,被赋予了独特的空间形式。这一空间形式并非苏联人创造,而是来源于法国古典主义^[34]。17 世纪末—18 世纪初,圣彼得堡的城市规划首次引入“三轴放射”的规划手法,新莫斯科中心区则重拾这一营建法则。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专家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实践活动。在规划方案编制过程中,苏联专家不同程度地参考或直接复制了莫斯科中心区“三轴放射”的空间特征(图 2)。以 1954 年穆欣主持制作的《兰州市总体规划示意图》为例,方案以省级机关为中心放射出三条轴线,分别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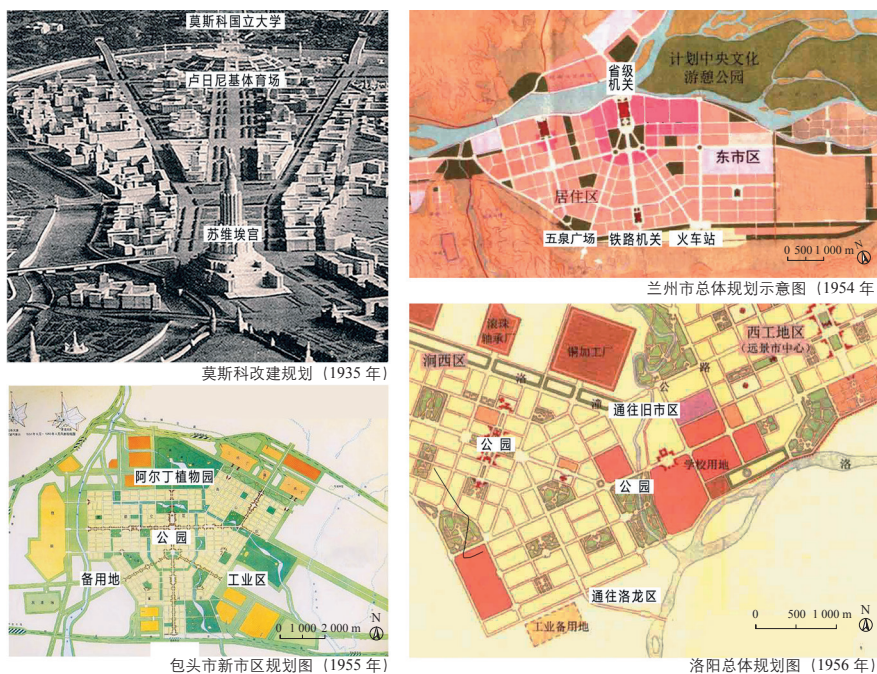


图 2 莫斯科改建规划(1935 年)和“三轴放射”在中国城市规划方案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左下图为作者根据 <https://baltija.eu/2021/07/14/kakoj-mogla-stat-moskva-po-genplanu-1935-goda/> 绘制,其余为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0]绘制

① 在苏联社会主义城市,中心区由各类行政机关、文化教育机构和国家公共机构构成,并不强调中心区的商业贸易职能^[15]。

五泉广场、铁路机关和火车站相连，建立了强烈的空间秩序。巴拉金（Баракин）参与制定的包头、洛阳的规划方案运用了同样的手法，即将标志性建筑、纪念集会广场、站前广场、大型公园、工业基地等重要元素作为对景，在此基础上形成笔直的林荫大道。新中国首批工业新城的建设基本遵循了原有的规划方案，时至今日，无论是从鸟瞰图看还是在城市中行走，均能感受到这一独特的空间结构。

3.2 采用“绿地系统”形成均衡有序的开敞空间

在社会主义城市中，绿地是城市用地中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5]。《莫斯科改建规划》大量增加了绿地的规模指标，构建了完整的“绿地系统”。所谓“绿地系统”，是将不同规模等级的绿地类型化，并将其均衡地分布于城市的各个区域，以便所有居民使用（表1）。在莫斯科，绿地占城市总用地的30.3%，包括24个城市级文化休息公园^①、20多个区公园、15个儿童公园、17个花园，以及数百个小游

园^[36]。受莫斯科经验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建设也采用了“绿地系统”的布局原则。在西安、大同、包头等地的规划方案中，大中小结合、均匀分布的绿地网络构成了虚实相生的城市空间。此外，绿化种植开始作为提升公共健康的卫生措施之一。在洛阳、西安、大同、包头等地的规划方案中，专门在工厂周围设置了“防护绿地”，以降低工业污染对城市的危害（图3）。

表1 苏联绿地系统类型及其设定标准

绿地类型	距离居住区的距离 / km	到达所耗时间的标准 / 分钟	
		步行	乘车
全市性文化休息公园	2.0~3.0	30~50	15~20
区公园	1.0~1.5	15~25	10~15
儿童公园	0.7~1.0	10~15	不作规定
花园	0.8~1.0	12~15	不作规定
小游园	0.4~0.5	6~8	不作规定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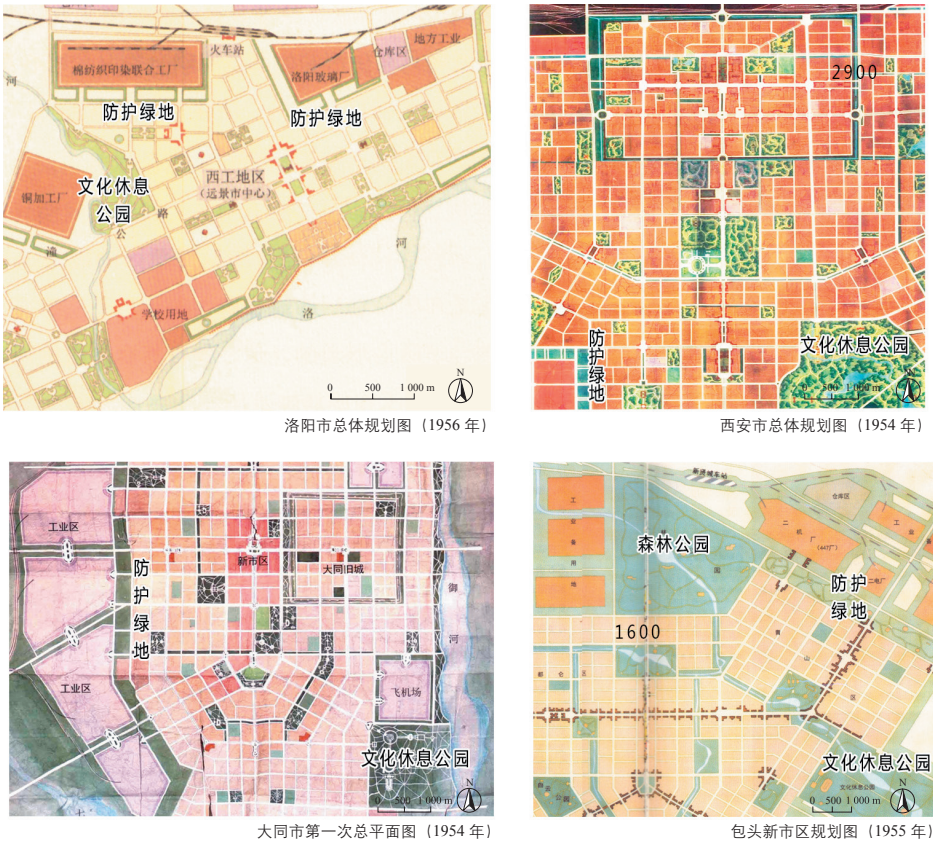


图3 “绿地系统”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城市规划方案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20]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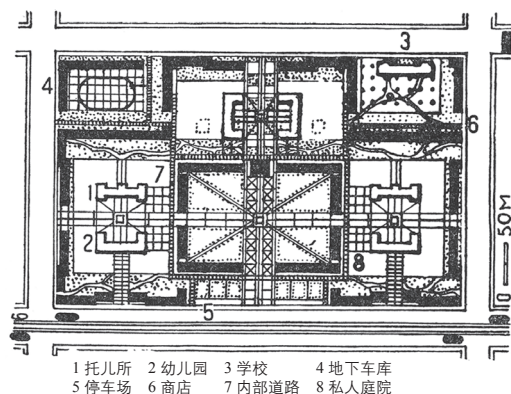
① 苏联第一个文化休息公园高尔基公园于1929年在莫斯科建成。作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大型综合性城市公园，除提供舒适的游览休息环境外，文化休息公园还承担着体育运动、文化活动、政治教育等多重职能。此后，文化休息公园理论传播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现代城市综合公园建设提供了设计参照。

《莫斯科改建规划》还试图打破城乡对立，将市区与外围自然环境结合起来，故提出将“楔形绿地”作为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在莫斯科郊区^①建设森林公园，作为城市新鲜空气的贮藏库和市民的休养场所，并将其从几个方向与市中心连接起来^[13]。1949 年以后，苏联专家在一些城市的规划方案中运用了“楔形绿地”的设计手法。1954 年穆欣指导的《成都市规划总平面草案》，将大块园林、田圃楔入城市，与中心区的公共绿地、林荫道以及护城河连接。1957 年勃得列夫（Будрев）主持编制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将“楔形绿地”作为规划概念写入说明文件，并提出：“公园绿地由绿带相连形成绿色走廊，楔形绿地由四邻楔入城市，城市外围如同莫斯科那样，选择适当地区建设一些森林”^[37]。此后，“楔形绿地”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绿地系统的一种特殊类型。在规划方案和实际的城市建设中，常常存在将郊区风景名胜和郊野公园楔入市区的做法（图 4）。

3.3 采用“扩大街坊”规划建设工人住区

1920 年代，针对机动车严重威胁儿童过街安全、传统城市交叉口过多等问题，美国规划师科拉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提出以“邻里单位”作为城市居住区的细胞，在较大范围内统一布置住宅^[38]。《莫斯科改建规划》探索并提出了类似概念——扩大街坊，要求新建住宅区采用 9~15 hm² 的扩大街坊，取代过去 1.5~2 hm² 的小街坊^[17]。扩大街坊的特点是沿着街坊外围设置周边式住宅，主要道路与内部环境隔开，建筑间距较大，人口密度较低，营造了宁静的居住氛围。街坊内部设置托儿所、幼儿园、停车场、商店、绿地等设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公共服务网络（图 5）。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住宅紧缺问题，急需一套可行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住房生产。在“以苏为师”的背景下，扩大街坊的概念得以传播^[40-48]，并成为 1950 年代中国工人住区规划建设原型。首都北京和重点建设工业城市大量采用了“扩大街坊”的空间组织模式，典型的案例包括北京百万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活区、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生活区、沈阳铁西工人村。街坊式住区是中国住宅发展史的重要阶段，见证了中国住宅由传统单层院落到现代多层住区的转变，记录了 1950 年代中国住区的建造技术和文化特点，是极具特色的住区类型。时至今日，街坊式住区强烈的形式感和秩序感已成为中国城市极具特色的城市景观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街坊式住区也成为当前我国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主要对象。然而，在实践中，街坊式住区的遗产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识和重视，相关改造活动多采用标准化的操作



注：该街坊面积为 15 hm²，居住人口为 6000 人。

图 5 《莫斯科改建规划》提出的扩大街坊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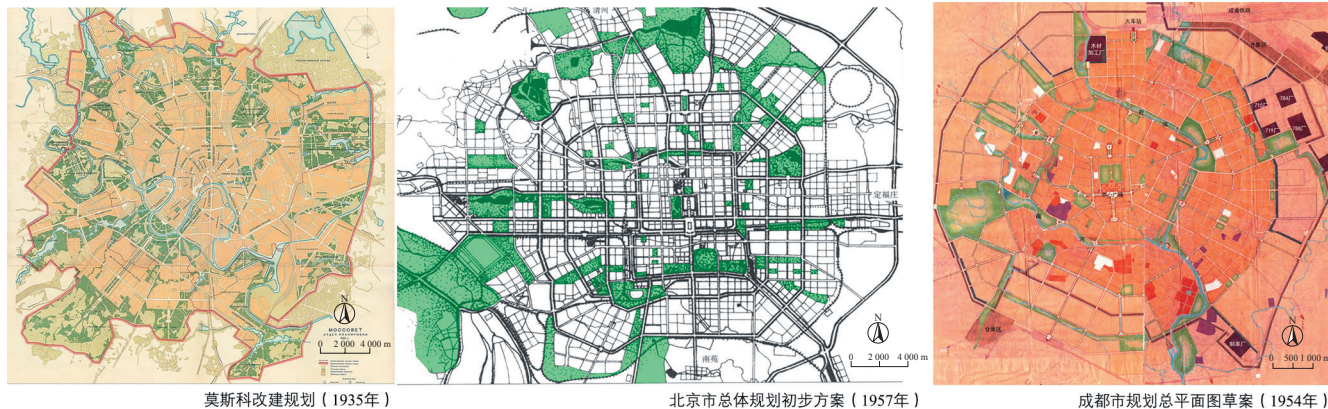


图 4 莫斯科改建规划中的“楔形绿地”及其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城市规划方案中的应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7,19-20] 绘制

① 《莫斯科改建规划》包括市区、郊区两个层次。郊区是市区规划的延伸部分，补充和完成在市区范围内无法满足的规划要求，郊区范围按照市区面积的 4 倍左右控制。

方式，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住区空间价值的彰显和历史文化的传承等关键问题（图6）。

4 结语

《莫斯科改建规划》作为20世纪城市规划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成果，是“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的经典范例。二战后，莫斯科的规划建设经验开始向不断扩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传播。就《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中国的传播而言，传播主体主要是1950年代在华苏联专家。受《莫斯科改建规划》影响较大的城市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城市，包括首都北京，以及156项目^①所在的工业城市，其作用方式包括两方面：一是苏联专家在指导规划工作的过程中，基于莫斯科经验向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者传授相关规划理念，影响了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构建；二是在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城市规划工作者们直接运用莫斯科

的相关营建手法，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形态塑造产生了影响。

本文通过讨论《莫斯科改建规划》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试图更好地追溯和把握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知识的源流。理念方法层面，人口规模与密度控制、公共健康导向的分区原则、多学科综合决策等理念，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具有可操作性，是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源头。作为内在的框架结构，这些初始的设定已嵌入中国当代城市规划的实践，其蕴含的对人居环境的重视、对公共健康的关怀、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空间形态层面，新中国初期的城市空间营建采用了与莫斯科相似的空间形式，三轴放射、绿地系统、扩大街坊等形态和内容仍隐含在当今的城市空间中，反映了规划理论跨国传播的现象，可视为规划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UPI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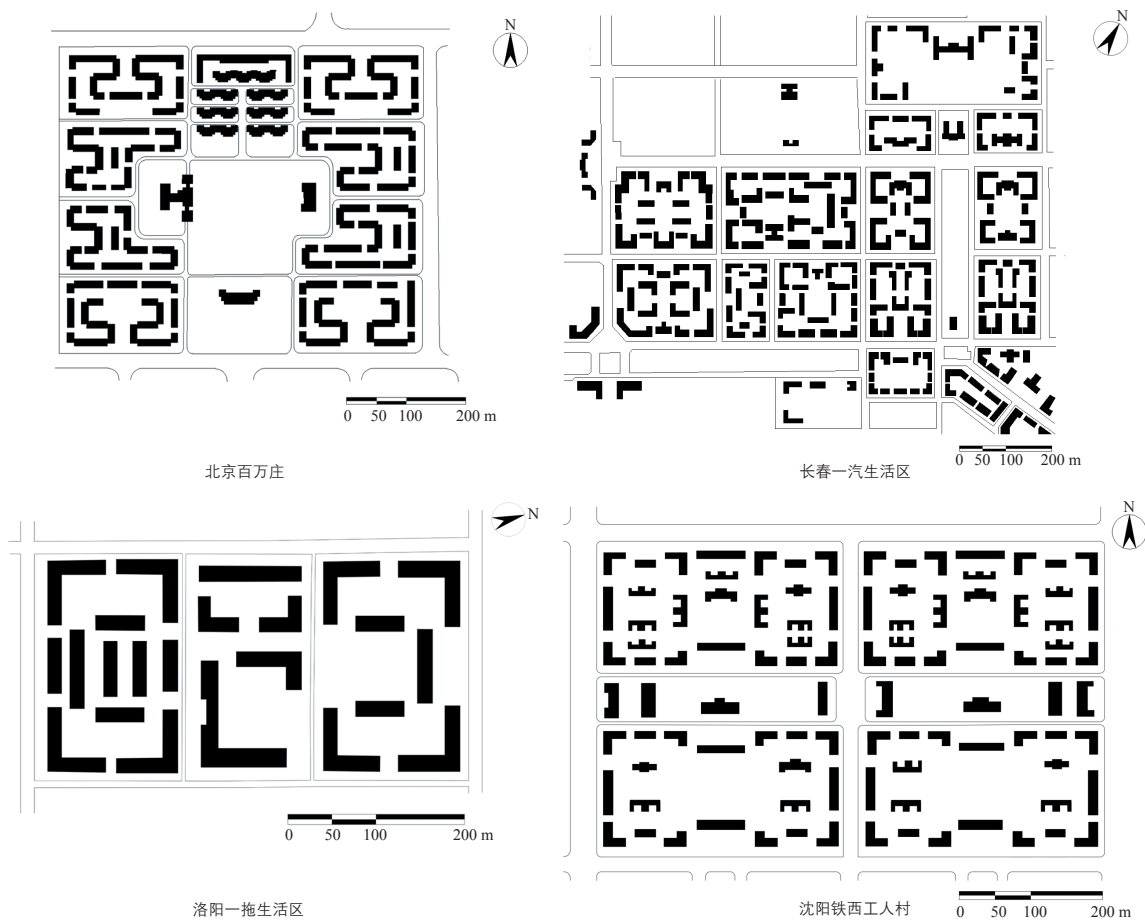


图6 新中国成立早期规划建设的街坊式住区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49-51]绘制

① “156项目”指的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主要分布在东北、西北和中部地区。

参考文献

- [1] WARD S. Cities as planning models[J]. Planning perspective, 2013(2): 296-313.
- [2] ESSAIAN E. The 1935 general reconstruction plan for Moscow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istoric city center[J]. Storia urbana, 2002(30): 51-75.
- [3] LANG H. Red Moscow: capital of the revolution or a revolution in capitals[C].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The 11th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Conference. Barcelona: U.P. Catalunya Press, 2004.
- [4] MAY R J. Learning from Moscow-planning principles of the 1935 general plan for reconstruction and its political relevance[C].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The 12th International Planning History Society Conference. New Delhi: Delhi University Press, 2006.
- [5] WILLIAM R. Hannes Meyer and the general pla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scow, 1931-5[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07(2): 109-124.
- [6] 侯丽.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现代主义城市乌托邦——对20世纪上半叶苏联的建筑与城市规划历史的反思[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1): 106-114.
- [7] 李浩. 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关于苏联规划模式源头的历史考察[J]. 城市规划, 2018(10): 77-85.
- [8]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卡冈诺维奇同志报告的决议[M]//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苏联城市建设问题. 程应铨, 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4: 27-41.
- [9] 凯瑟琳·库克. 社会主义城市: 1920年代苏联的技术与意识形态[J]. 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 2013(1): 213-240.
- [10] 卡冈诺维奇. 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M]//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苏联城市建设问题. 程应铨, 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4: 1-26.
- [11] DENIS J, SHAW B.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Soviet City Plan[J]. Planning perspectives, 1991(2): 125-138.
- [12] WARD S. Soviet communism and the British planning movement: rational learning or utopian imagining[J]. Planning perspectives, 2012(10): 499-524.
- [13]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五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175.
- [14] 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 城市规划设计参考资料: 关于莫斯科的规划设计[M]. 北京: 北京市人民政府都市计划委员会, 1954: 1-32.
- [15] 阿方钦科. 苏联城市建设原理讲义[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7.
- [16] CONTERIO J. Controlling land, controlling people: urban greening and the territorial turn in theories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1931-1932[J].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22(3): 480-502.
- [17]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 关于改建莫斯科的总体计划(1935年7月10日)[M]//科斯塔布赫泰夫.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二卷)(1929—1940). 严敬敏, 官静娴, 刘宇端,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591-604.
- [18]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 岁月回响——首都城市规划事业60年纪事(1949—2009)[R]. 2009.
- [19] 李浩. 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2.
- [20] 李浩. 八大重点城市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 [21] 曹言行. 我对于苏联建筑科学的几点体会[M]//中国科学院秘书处. 学习苏联先进科学: 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报告汇刊. 北京: 中国科学院出版社, 1954: 397-409.
- [22] 巴兰尼克夫.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关于北京市未来发展计划的报告(1949)[Z]. 岂文彬, 译.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001-009-00056: 5-6.
- [23] ANTHONY S. The Rise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1800-1914[M]. London: Mansell Press, 1980: 57.
- [24] 刘旭. 移植与涵化: 俄日侵占时期的大连中心城区空间结构演变[J]. 大连城市历史文化研究, 2017: 63-90.
- [25] 贝林金. 斯大林的城市建设原则[M]//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 苏联城市建设问题. 程应铨, 译. 上海: 龙门联合书局, 1954: 42-53.
- [26] 刘诗响. 启蒙老师不能忘[M]//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五十年回眸——新中国的城市规划.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42-147.
- [27] 孙平. 上海城市规划志[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28] 奥斯特罗夫斯基. 现代城市建设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
- [29] 许皓. 苏联经验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研究[D]. 南京: 东南大学, 2018.
- [30] 都市计划座谈会会议记录(1952)[Z]. 北京市档案馆, 档号: 150-001-00003: 29-34.
- [31] 李浩. 城·事·人: 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二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32] 大维多维奇. 城市规划: 工程经济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 [33] 列甫琴柯. 城市规划: 技术经济指标及计算[M].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4.
- [34] 唐相龙. 苏联规划在中国: 兰州第一版总规编制史实研究(1949—1966)[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 [35] 阿尔钦柯. 苏联城市中绿化建设的发展[J]. 城市建设译丛, 1956(7): 43-44.
- [36] 卢思茨. 绿化建设[M]. 朱钧珍, 译.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6.
- [37] 刘亦师. 楔形绿地规划思想及其全球传播与早期实践[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3): 109-118.
- [38] 许皓, 李百浩. 思想史视野下邻里单位的形成与发展[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4): 39-45.
- [39] ERIC M. CIAM and the Communist Bloc, 1928-59[J]. 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009(2): 237-254.
- [40] 苏联建筑科学院. 4~5层居住街坊规划、建筑和公共设施参考条例[J]. 城市建设译丛, 1955(2): 3-11.
- [41] 列甫琴柯. 4~5层居住街坊建筑的经济问题[J]. 城市建设译丛, 1955(2): 11-16.
- [42] 阿拉宾. 必须重视综合修建街坊的原则[J]. 城市建设译丛, 1955(2): 1-6.
- [43] 常友石. 街坊及住宅标准设计[J]. 建筑学报, 1956(2): 113-121.
- [44] 捷尔诺夫斯卡娅. 论街坊的修建例[J]. 城市建设译丛, 1956(3): 14-16.
- [45] 李仁山. 论街坊布置中的若干问题[J]. 城市建设, 1956(5): 8-11.
- [46] 李锡均. 关于街坊形式与大小的研讨[J]. 城市建设, 1956(6): 23-25.
- [47] 克里莫夫. 莫斯科西南区居住街坊的设计经验[J]. 城市建设译丛, 1956(8): 14-19.
- [48] 德鲁日尼娜. 街坊建筑的综合设计方法[J]. 城市建设译丛, 1957(2): 14-21.
- [49] 吕俊华, 彼得·罗, 张杰. 中国现代城市住宅(1840—2000)[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50] 孙莹. 洛阳涧西工业区街坊活力再生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3.
- [51] 李晓宇, 王红卫, 孙明君, 等. 沈阳铁西工人村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探索[J]. 城市设计, 2022(2): 28-39.

(本文编辑: 王暄)



本文更多增强内容扫码进入